

第九卷



教制教典与教学
佛教史地考论

印顺法师
佛学著作全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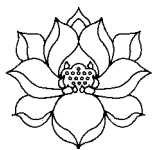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华书局

印顺法师
佛学著作全集

第九卷

教制教典与教学
佛教史地考论



中华书局

第九卷目录

- 教制教典与教学 (1—146)
- 佛教史地考论 (1—270)

目 录

一 泛论中国佛教制度	1
二 中国佛教前途与当前要务	7
三 僧装改革评议	14
一 僧装改革运动之回顾	14
二 先要认清立场	15
三 僧装的特点与问题	16
四 中国僧装改革的争论重心	18
五 向反对改革者进一言	18
六 回到祖国的怀抱中来吧	19
七 新乎僧乎	22
八 我的建议	29
四 僧衣染色的论究	34
一 袈裟是什么	34
二 二类僧衣	35
三 坏色是点净	36
四 坏色是染净	37
五 应用何种染色	37

六	点净与染净	38
七	金黄色衣	40
八	印度僧侣服色不同	42
九	中国僧众服色沿革	43
五	建设在家佛教的方针	47
六	关于素食问题	56
七	编修藏经的先决问题	65
一	前言	65
二	求精要——选藏·续藏	66
三	求完备——新编整体大藏经	68
四	求通顺易晓——语体文本	69
五	求传布世界——译藏	72
六	两项先决问题	73
八	佛书编目议	76
九	论僧才之培养	88
一	弘法人才的重要	88
二	律学中心	89
三	禅学中心	91
四	教学中心	93
五	现代的弘法人才	95
十	论佛学的修学	99
十一	谈修学佛法	105
一	论闻法	105

二	学法之目标与程序	107
三	初学者从三门入	115
十二	学以致用与学无止境	118
一	总说	118
二	用在修行	121
三	用在学问	124
四	用在事业	132
五	劝除三病	135
十三	福严闲话	137

目 录

一 中国佛教史略	1
一 绪言	1
二 佛教之输入中国	2
三 大道南行	6
四 一帆风顺之南朝佛教	13
五 唯心论之确立	21
六 中原佛教之隆盛	29
七 新佛教之成长	34
八 南北东西与中华	43
九 佛教在平流起落中	51
一〇 变	61
二 印度佛教流变概观	63
三 佛灭纪年抉择谈	70
一 绪言	70
二 阿育王传的内容	72
三 编纂的时地考	75
四 优婆塞多中心的法系	84

五	阿育王中心的王系·····	104
六	二大传说的比观·····	121
七	结论·····	127
四	论佛灭的年代·····	130
五	纪念佛诞说佛诞·····	137
六	龙树龙宫取经考·····	141
七	《楞伽经》編集时地考·····	148
八	文殊与普贤·····	154
九	护法韦驮考·····	161
一〇	大乘经所见的中国·····	165
一	中国的地志·····	166
二	中国的护法神·····	168
三	中国的圣王·····	171
四	中国佛教的圣地·····	172
五	中国的圣者·····	172
六	于阗·····	173
七	中国的政教情形·····	175
八	杂事·····	176
一一	从一切世间乐见比丘说到真常论·····	178
一二	北印度之教难·····	187
一	绪言·····	187
二	三恶王毁法的传说·····	188

三	迦旃延与僧伽罗刹的忠告·····	194
四	千年法灭说的修正·····	198
五	罽宾灭法与师子比丘·····	199
六	弥罗掘的灭法·····	205
一三	论笈多王朝的王统·····	212
一四	世亲的年代·····	216
一五	汉明帝与《四十二章经》·····	225
一六	玄奘大师年代之论定·····	235
一七	点头顽石话生公·····	248
一八	佛钵考·····	265
一九	释伽罗王卢头陀摩·····	269
二〇	阿梨车毗伽的自移塔·····	270

一 泛论中国佛教制度

佛教,当然是“正法”中心的。然佛法弘传于人间而成为佛教时,正法就流布为“法”(经)与毗尼(律)两大类。这二者,有它相对的特殊性能。大概地说,这是智的与业的;义理的与制度的;个人的与团体的;契真的与通俗的;实质的与仪式的;行善的与息恶的。这些相对的差别,不是可以机械地孤立,而有相应的、相依相成的关系。佛教是这二者的总和,因此必须是二者的均衡发展,适当配合。也就是说,必须尊重二者的独特性能,从综贯的协调中,给予充分的发展,这才能成为完整与健全的佛教。不然,偏颇的畸形发展,势必成为病态的、偏枯的。不幸得很!佛教早就偏于法的发扬了!起初,保守的上座们,固执毗尼——戒条与规制而成为教条,繁琐的仪制。于是乎激起反抗,甚至极端地轻视毗尼。毗尼的固定化与普遍忽略,引起佛教僧众的无法健全,“龙蛇混杂”。偏于法的发扬,与毗尼脱节,不但失去了集体的律治精神,法也就堕入了个人的唯心的窠臼!

弘扬佛法,整兴佛教,决不能偏于法——义理的研究、心性的契证,而必须重视制度。佛教的法制,是毗尼所宣说的。这里面,有道德准绳,有团体法规,有集体生活,有经济制度,有处事

办法。论僧制或佛教制度而不究毗尼,或从来不知毗尼是什么,这实是无法谈起的。所以热心中国佛教行政、制度的大德们,实在有论究教制的必要!

释尊的时代,毗尼主要是为出家众而建立的。“六和”僧制,并不通于在家众(所以毗尼不许白衣阅读),这是时代使然。古代的佛教,出家众有团体组织,而在家众是没有的。现在,在家众应有团体组织,与僧众混合为一吗?别立在家众的集团吗?无论如何,对于如来所制的团体原则,也还有遵循的必要。

律制或者说僧制,到底是什么?关于这,首先应确切地认定:僧制与政治的本质同一性。从僧制的来源去看,就会明白。“僧伽”译为众,就是群众。但不单是多数人,散漫的乌合一群,而是有组织有纪律的集团,所以或意译为和合众,大体同于神教者的教会。僧伽与另一种名为“伽那”的,都是印度固有的团体名称。这或者是政治组织——某一区域(律中称为“界”)内的宗族会议或人民集会;或是商工业的组合制度。古代的印度社会(实是古代社会共通的),进入父家长的宗法社会时,人口繁衍而渐次形成家族、部族、种族的集团。部族以及种族内的事件,由各部族的首长,或全族成员的会议来决定。国王,或是推选的,或是世袭的,但权力大都有限。这种古代的共和民主制,自来就与狭隘的种族偏见相结合,所以贵族的民主脚下,踏着无自由无产业的奴隶层。在印度,这就是首陀罗族。等到时代演进,奴隶层开始反抗时,这种政治便走向没落,代以王权的专制政治。王权的扩充,是在推翻贵族,宽待奴隶阶层而逐渐完成的。释尊时代的东方印度,恒河东北的后进民族,如跋耆、摩罗,

还过着古代的民主生活；恒河南岸的摩竭陀，已倾向于王权的集中。当时东方新宗教的勃兴，都是适应这一政治倾向，反抗婆罗门教而鼓吹种族平等。这些新宗教，都有教团的组织。其中，如耆那教称为伽那，佛教称为僧伽。这种宗教集团——僧伽或伽那，都是参照于政制，而使合于宗教目的。政治制度与僧伽制度，可说是同源异流。佛教对于僧伽的一切，称为“僧事”，就是众人的事；政治不也就是众人之事的治理吗？所以僧制与政制，本质上同是人类的共处之道，不过对象不同而已。多数人的集合共处，不能无事，有事就不能不设法去解决。如何消除内在的矛盾，如何促进和乐的合作，如何能健全自己而适合生存，如何能走向更合理的境地，如何能实现理想的目标：政治制度与僧伽制度，由此产生，也由此而有演变。不过佛教僧制，虽取法当时的政治与其他宗教的组织制度，然在佛的正觉中，体悟到事事物物的依存关系——缘起性；体悟到缘起诸法的“无常性”、“无我性”、“寂灭性”，从这正觉的大悲中，建设僧伽制度，自有他卓越的特色。肯定人类平等，否认贵族与贱族、主人与奴隶的阶级；男女平等，而并不模仿帝国形态，保持民主自由的制度。唯有从佛的根本教义与僧制的原则中，才能理解佛教的处群治事之道。

有佛教，有僧伽，就有制度。教制是必须顾全到古代的佛制，演变中的祖制，适合现实情况的修正或建立。佛教传来中国的时候，印度的佛教，早已在不大重视毗尼的情况中。部分的重律学派，也只是繁琐仪制的保守；拘守小节，忽略时空的适应，不能发扬毗尼的真精神。所以中国的佛教僧制，起初虽仿效印度，“依律而住”，而实不曾有过像样的僧制。在佛教继长增高的阶

段(会昌以前),僧伽的混滥秽杂,每与佛教的扩展成正比例。南朝的佛教,北魏文帝复法以后的佛教(特别是元代的喇嘛),莫不如此。所以佛教在中国,可说教义(法)有着可赞美的一页,而教制——律制是失败的。然佛教不能不有足以维持佛教的僧制,不能不有适应环境的僧制;等到发觉形式剿袭的印度僧制不能完成任务时,中国的佛教僧制,就向两方面演化。

一、国家的管辖制:这因为佛教发达,僧众跟着杂滥起来,影响社会,影响国家,国家不能不出来干涉。我们应该记着!这是佛教的耻辱,古代有多少正信的缙素,明里暗里在痛心。然而僧众不能健全,不能自治,也就不能怪政治的干涉。古代的政治干涉,大体是善意的,如淘汰僧众,禁止私立寺院,试经得度等等(如恶意即灭法)。如姚兴是佛教的大护法,他却立僧碧为僧正。梁武帝更是有名的护法,但他不忍见僧众的秽滥,甚至想自己出来作大僧正。国家的管辖,对于不健全的佛教,实际是有益的。这种管辖制,是国家通过佛教来管理,可说是以僧治僧。姚兴立僧碧为僧正,是这一制度的开始;后代的僧统、僧录司等都是。

二、禅僧的丛林制:形式剿袭的律制,自有碍难通行的地方。全盘印度化,或者中国本位化,在东晋末年已引起争论了。谈玄说妙的南朝,当然不能有什么革新。强毅实行的北方,却有新的制度出现。如禅僧的“别立禅院”;三阶教的自成家风,舍戒入俗的三阶信徒,也是“别立科纲”。别立禅院的禅僧,在唐代,适应山林农村环境,参照佛陀的僧制,创设丛林制度。“一日不作,一日不食”;他们“辟土开荒”讲求经济自足。这个制度,配

合着真参实悟的信心与精进(法的),确乎相当成功。佛教的思想界,虽已因固定、保守而走向衰落;亏了这丛林制度,总算维持佛教一直到最近。

这两种中国化的教制,一是每一寺院的组织,一是全国佛教的组织,并行而不相悖,一直维持到清末。但中国是家庭本位的宗法社会,而政治又缺少民主代议制,所以寺院逐渐子孙化,丛林也产生传法制,倾向于各自为政,不能从僧官制的统一中,造成民主代议制的严密组合。一盘散沙,佛教与国家民族,患着同样的毛病。

自从西洋的势力侵入,中国的一切都起着剧变。国家多事,简直顾不到佛教,或者不重视佛教,所以让它自生自灭地没落。佛教内部的丛林古制,老态龙钟,不能适应新的剧变。僧众的品质低落,受到古制的束缚、社会的摧残,迅速地衰落下来。禅宗的大德们,除了造庙、修塔而外,还能做些什么?中国佛教进入了从来未有的险恶阶段。太虚大师看透了这点,所以大声疾呼,提倡教制革新。民国四年,写成了《整理僧伽制度论》。以后时势演变,又写《僧制今论》、《建僧大纲》等。以虚大师的僧制思想来说,虽有时迁就事实,而根本主张,还是想合于佛制,僧事僧治,可说是综合过去的二元的僧制——僧官制与丛林制,统一在新的僧制中。对于在家众,有佛教正信会的建议(国内也有了居士林等组织);希望僧众与信众,都有健全组织,共同来复兴中国的佛教。这虽然与现今南方的佛教国相合,但在中国,不但是墨守老祖规矩(不是佛的律制)的僧众要反对,而时势也有些难以办到!

早在民国元年,中国佛教开始了一种新制度——中国佛教会,这是一种僧俗混合组织的制度。现在已被看作一向如此,其实是从来未有的划时代的剧变。依律制,出家众的僧事,白衣就是国王,也不容直接过问。现在的混合组织,论法理颇有问题。同时,任何团体,参加者有义务,有权利;而过去大陆的佛教会,不一定如此。这个出家在家的混合组织,所问的是僧尼寺庙事件,经费的来源,也主要是从寺庙中来。而在处理事务,甚至创立法制,由于僧众无人,大都要烦劳在家众。有的出家众不赞成如此,而事实却不能不如此。问题在佛教的外来压力太重,而僧众缺乏组织能力,缺乏向社会向政府的活动能力。佛教——寺院僧众为了维持佛教,自然而然地恳求护法们出而护持。这里面,有久已信佛的,有临时信佛的,甚至有根本没有信心的;有军政名流,豪商巨绅,有时还要拉拢帮会、外道。而正信居士,眼见佛教的多难,也热心护法而不能不问。老实说,离开了在家众,佛教会也许就成立不起来。所以我觉得,护法居士的参预教会,并不合(佛)法;或者不免人事庞杂,邪正混滥,而事实却不能不如此!

我们应认清现阶段的中国佛教制度的特殊意义!希望在这现存的组织中,力求进步,求僧众与信众的品质提高(品质主要是正信、正见、正行),完成护法责任;进一步地促进而使发展到更合于佛法的教制僧制!

二 中国佛教前途与当前要务

教难、国难，现阶段的中国佛教徒，正受着这双重的磨难。东南亚地区——香港、澳门、菲律宾、越、缅、泰、马来亚、新加坡、印尼、锡兰、印度，以及日本、南韩，到处有中国佛教徒的踪迹，虽呼吸自由空气，而由于时局不安定，困难也增多。比较地说，住在台湾的，是安定幸运得多了！然台湾籍的信徒，由于长期与祖国脱节，有点神佛不分。而新近自大陆来的，为数不多，在教化与种种工作上，也不免有才难之叹。中国佛教的厄运，虽由于时局好转而跟着好转，然我们切勿自我陶醉，存有幻想！我们必须认清，近代的中国佛教，本来不够健全，不够理想。经此一番大破坏，留下一笔糊涂账，已不再是改良或整理，而需要从废墟上来重新建立了。这是怎样的艰巨！这岂能从幸运中得来！这一切，必须中国佛教同人，从速改进组织，奠定新生的基础。否则，我们——中国佛教的境遇，也许比现在还要苦痛得多！

中国佛教，因内伤外感而来的情势恶化，确乎相当严重！然从世局转移与社会变动去观察，中国佛教的前途，是用不着悲观的，反而充满了新生的希望。这可从两方面说：

中国佛教的内伤，是多年积弱。首先是，撑持了千年的禅

宗,虽曾经隆盛到极点,然禅者专重向上,专重直观,轻视严密的义学,事相的修习,佛教这才从平淡而贫乏,贫乏而衰落起来。陈陈相因,禅宗也就失去开建时代的活力与创新精神,变成丛林祖制的保守者。无上妙方便,失去了时代意义,适应活力;本身不能适应时代,反而或多或少的障碍着进步。四十年来以坐香维持门庭的禅宗,日渐没落,到现在可说形骸都没有存在了。禅宗已失去中国佛教主导者的能力,将退居佛教一宗的地位。佛教的思想与制度,不再是旧制所能束缚,而有依承佛制,参酌古今,本古代禅家的长处而重新建设的必要。

中国佛教不容易前进的大障碍,是寺院家庭化。中国为宗法社会的国家,家庭意识,使佛教变质。一方面,佛寺不传贤而传(法)子,结果如通货一样,劣质的通货打倒了优良通货;住持的资格,也不再是德学而是应酬与攀缘了!一方面,丰富的寺院经济,成为内部的侵轧因素。既不用于文化事业、福利事业,自不免成为社会觊觎的目标。太虚大师常说:中国佛教的教产,活像一块臭肉,徒引来蝇蚁恶狗,大抵在愚僧与土豪、劣绅、地痞、流氓的勾结中消耗净尽。现在经过一番大变动,家庭的宗法制,无疑地要随时代而过去;寺院土地,也不免成为问题。中国将来的政治非趋向修明不可;土劣流痞也决不会过去那样的,寺院无脂可吸。我们尽管困难,却有摆脱恶势力,而进行佛教合理建设的可能。

中国佛教过去,病在脂肪过剩,不肯运动,臃肿不灵。等到体力衰退,又积食不消,这才从外强中干,演变到奄奄一息。时代的苦难,等于节食或绝食一番(留心虚脱!)。经过一番净化